

“文革”事件紀實

步行井岡

張曉雪著

725

香港文學報社

WEN GE SHI JIAN JI SHI

“文 革”事 件 紀 實

步 行 井 崗

張曉雪著

香港文藝出版社出版公司

交權字第 62 號

步行井崗

著 者：張曉雪

責任編輯：徐一清

校 對：張小兵

出版發行：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公司

社址：香港九龍土瓜灣下鄉道 36 號華強大廈 2 字樓 B 座

電話：23305870

傳真：23642320

印刷：淮陰華文印刷廠

開本：850 × 1168 1/32

字數：150 千字

印張：7.25

初版：2000 年 11 月 15 日 印數：1 - 1000

國際統一書號：ISBN:962 - 962 - 062 - 4

定價：港幣 13.8 元 人民幣：14.50 元

自序

“序”在今日大体也是一种广告。请领导、权威、名人、明星作序包装自己，作品自然会增色增值不少。我没这个福分，高攀不上。我只能自己作序，很没面子的。

我写《步行井冈》是为偿还一笔“情债”，释解我多年来不灭于心的井冈情结，释解我始终不渝对伟大领袖超凡气魄的敬佩之情。三十多年前，数百万中国青年学生打起行装，飒爽英姿，迈开双脚奔向祖国各革命圣地朝拜。他们效仿红军长征，南北驰骋，纵横万里，轰轰烈烈，浩浩荡荡。毛泽东在“文革”中亲手导演的这场“步行大串联”空前绝后，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奇观。亲历这一奇观的我，至今仍为之自豪。然而，这段经历的底色却是灰暗的，回忆这段极不寻常的人生经历，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萌生写书念头之时正是我离岗赋闲之日——1996年的深秋，离开我步行井冈恰好整整三十年。那时候，凄凄惨惨戚戚字字血声声泪的“知青文学”早已风靡一时，造就了声名显赫的一代知青作家，也养育了文学界影视界无以数计的灿烂明星。该说该写该唱该演的似乎都已山穷水尽无一遗漏，文学文艺也该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了。而我却不人时宜地开始写这本记实的《步行井冈》，触及“文革文学”遗忘的角落——步行大串联。从那时起直至2000年仲秋，我终于收获了自己的宿愿。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而我从播种、耕耘直到收获却整整惨淡经营了四年！何苦来着？只因那里面有我的艰辛苦

旅,有我的快乐颠狂,有我的顽强执着,有我的纯真幼稚,有我的友情也有我的初恋。

“文革”运动结束二十年后的1986年,中国文坛泰斗巴金先生大声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先生的愿望如能实现,倘若我这本小册子能在这个博物馆内落户,为“文革”重要事件之一的“步行大串联”作一解说或是作一注脚,那将是我的莫大荣幸。

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人们对某个题材充满期待并形成可怕共识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做蠢事的时候。”(巴菲特)现在新生代的青年人对在个人崇拜狂热下产生的诸如红卫兵、“四大”、“大串联”、“斗批改”、“文攻武卫”、“上山下乡”等“文革”事件觉得不可思议,但只需稍稍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发生的民工潮、出国潮、经商下海热、房地产热、“六·四”和“股疯”等事件,你也许就不难找到和我们这代人沟通的渠道了。

食草者善走而愚,食叶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夭,唯有食气者神明而寿。人活一口气,难得写一回。我写《步行井冈》既为了自己,也为了人称共和国长子的我们那一代人。自1966年秋我踏上步行井冈第一步的那一刻起,我就有心记录下这段也许会影响我一生的非常历程。三十年一梦,如愿以偿!我不想矫饰我那时的狂热、单纯和幼稚,我只想告诉后来者:老一辈中华精英曾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自己、激活民众;我们那一代人也曾忧国忧民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为此,我们曾经那样生活过、奋斗过。我不敢奢望补“文革文学”之缺,思“文革青年”之得失教训,但得一丝一毫,足矣。

张晓雪

2000年9月19日夜写于蜗居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年轻的错误	1
“革命行动”	12
拒绝女生	18

第二章

千里之行第一步	27
句容会议	35
乡情	39

第三章

小李庄轶事	43
山沟里的联欢	52
无助的援助	58

第四章

深山夜行	63
巧遇儿童团	68
茂林悲秋	73

第五章

戴眼镜的上海人	81
中校军官的传奇	87
暮色苍茫樵山岭	91
黄山之旅	96

第六章

女生病了?	107
不准恋爱!	114

第七章

茶乡瓷都	122
“孤岛难民”	131

第八章

冬雨	136
老表	150
演出	159
旌旗十万上井冈	169

第九章

昼夜兼程二百四	176
拜山	184
毛主席下令空投	191
“周总理来了”	201

第十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208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日	213

后 记	220
-----------	-----

第一章

年轻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是我们这一代人终生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我是江苏省镇江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是年五月,人民共和国动荡颠簸,躁动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神州大地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

5月10日,全国各大报纸头版发表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三家村”》,由此掀起了波及全国的“革命大批判”浪潮。

数月前,姚文元也曾发表过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却未能搅动学校这潭“死水”。虽然校方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组织全校师生认真学习,但学生们依旧整日埋头扎根于书本,波澜不惊。尤其是我们这批应届毕业生,高考在即,决定人生命运前途的冲关时刻就将到来,谁还有闲心闲空去研读这类与高考无关的“批判”呢。

那时,“文革”风暴还在酝酿之中,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的“政

第一章

治嗅觉”又很不灵敏；此外，我们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姚文”深刻的政治背景和厚重的政治内幕，因而读不出“姚文”内里暗藏的“杀机”及其锋芒所向几乎是必然的。学校党委虽然也领导组织师生们学习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革命大批判”文章，但却是公事公办，走走过场，并无超常规的异动。

我自幼喜爱历史。海瑞的故事、邓拓的杂文也读过一些。但姚的文章我却读不懂、识不透。于是我抽空请教了一位政治教师。这位老师告诉我，那是文人打笔墨官司，属于学术研究范畴。

《评“三家村”》发表后，形势陡然起了变化。学校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每天停课半天，专门学习讨论“姚文”及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有关文章，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时不时的，校领导还亲自带领我们去工厂、农村参加工人农民批判“三家村反党黑线”的大会。

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特别是我们应届毕业生还是心不在焉，虚与应付。

高考一天天地逼近，“革命”形势也在一天天地加速向前发展。

6月2日，我从广播中听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久，我又在报上读到了北京市女一中的学生就请求国务院废除高考制度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的紧急倡议书；紧接着又看到了一张从北京辗转抄来的大字报，其中央有这样一张类比表：

封建科举制和现行学制类比	
古 代	现 代
县试——童生	初级小学考试——初小生
府试——童生	高级小学考试——高小生
院试——秀才	初级中学考试——初中生
乡试——举人	高级中学考试——高中生
会试——贡士	大学考试 ——大学生
殿试——进士	研究生考试 ——研究生

如此大胆鲜明的对比,是我们这些小城市小地方的“党的好孩子”想都不敢想、想也想不出的!我在极度震撼之余,私下里不得不叹服京城里同龄的同学们制出的这张“类比表”的精巧和准确。但我却不敢顺着这个“类比表”的思路延伸下去,延伸下去是十分可怕的:难道说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在沿袭一千多年来的封建科举制吗?现行的考试入学制度会废除吗?今年的高考还考不考?

几乎在一夜之间,全中国的老前辈老革命都遇到了新问题!党组织、校长、老师和家长谁也回答不了我的这些疑问。而这些疑问又恰恰与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生的前途生死攸关!大多数同学不得不放下课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这场决定我们命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

也有少数同学依然故我,每日复习不辍。这些同学多为来自农村的贫困生、人民助学金资助上学者。白天他们和大家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晚自习后,他们仍偷偷地在路灯下甚至钻到厕所里去复习功课。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杜书龙就是其中的

一个。班上的城里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蛀书虫”，并指责他这个团支部书记头脑里“封资修、学而优则仕的流毒”太深。

其实，“杜书龙”们只不过是比城里富裕家庭出生的学生更为现实一些。高考和“文革”相比，高考对于他们这样揣着农村户口的穷学生来说，是跨入现实社会、上层社会的唯一机会和希望。这种现象也算是一种“富不思进，穷则思变”吧，“文革”前的学生群体大体如此分化，“文革”后直至现在又何尝有所改变了呢。

然而，一场不期而遇的“革命”无情地毁灭了“杜书龙”们的机会和希望。

高考没有像往年一样在七月上旬如期举行。七月底，广播里终于传来了中央的决定：全国大、中学校停课半年闹革命！几个月来心悬在半空中上不上下不下的高三毕业生总算落了地。有人高兴，有人沮丧，有人困惑，有人仍然满怀希望等待来年。但无论抱着怎样的心态，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浪潮之中去了。

那段时间的“革命”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做“天翻地覆”，什么叫做“一天等于二十年”。许多有生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新鲜语言层出不穷接踵而来，它们纷纷以“革命”的名义扭转我十二年平静的学生生活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认识方法。

“革命”最初是从批判“师道尊严”开始的。首批殉难的就是教师。仅仅一个早晨，昨天还在传道受业解惑的“师者”不仅失去了师道尊严，而且还失去了人的尊严。一个又一个教师被自己的学生强行拉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前，屈辱地戴上自己的学生糊制的高帽子，被迫一字一句、诚惶诚恐地大声念读自己的学生写的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四处是口号、谩骂、蔑视和训斥，但

却没有抗辩。

我有一位“高一”时的语文老师，他在讲授鲁迅的名文《纪念刘和珍君》时的那种忘我投入、悲壮激昂、声情并茂，让我感染至深，至今难忘。“运动”刚刚开始，他就被“揪”了出来，因为有一张大字报揭发他在日伪时期曾当过税警。

我还有一位俄语老师，他在给我们授课的四十五分钟里，简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每个同学的神经紧张得几乎都要崩溃。他教新俄文单词，只在黑板上写出中文，再领读三遍该单词的俄语发音，然后按花名册随机抽取学生立刻到黑板前去写出对应的俄文。上他的课，我们总是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懈怠。由此而来，我们的俄语成绩提高极快。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多次在全市主讲《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青春之歌》、《红岩》的读书报告会，不带原著，没有讲稿，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在全市名噪一时。“运动”开始后，他也未能逃脱厄运。一张大字报揭发他曾任国民党时期《新江苏报》副主编。仅凭着这个“历史问题”，便足以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我受校红卫兵总部指派去校园东南角的菜地检查“牛鬼蛇神”们（被揪斗的教师）的“劳改”（监督劳动）情况。一位我最熟悉最敬佩的老师趁看守人（一群女生）不注意，突然拉住我背过身去，随即迅速从裤裆里掏出他的那个“家伙”，指着它万分急切而又万分痛苦地对我说：“老张，你看，都烂了！能不能准我一天假去医院看看。”这也许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为难办的事之一！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位平时在课堂上道貌岸然的人民教师竟会沦落到如此地步。看到他那个溃烂发黑的“家伙”和一脸痛苦屈辱的神情，我像是活吞了一只苍蝇，酸涩的胃液直往上翻腾。狂飙之下，斯文扫地；烈焰之中，玉石俱焚！人的尊严究竟能承受多大暴力的冲压？

我记得我终于下决心冒险，很仗义地准了他一天假。

我不忍心！

我父亲也曾是一名教师。

五十年代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女主角瓦尔娃娜·瓦希列夫娜在我头脑中刻印下的神圣而崇高的教师形象让我的良知难以在顷刻间泯灭。

混乱不堪的“大批判”没过几天，镇江市委向省镇中派驻了工作队。我意外地被选调进工作队材料组。分配给我的工作竟是抄写、整理大字报揭发的教师的“罪行”。这大约是因为我的阶级出身好，还因为我是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共青团员，根正苗红。

“红卫兵”最初是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副“文革”中最著名的对联一道传入我们学校的。这副据说是首都红卫兵撰写的对联在我校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许多师生贴出大字报反驳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革谁的命，造谁的反？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大批判文章中首次引用了一条毛泽东未曾公开发表过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此话一出，反对“红卫兵”和反对那副对联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便销声匿迹了。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代表。我校出身“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组建的红卫兵也就应运而生了。“司令”是高三（一）班的钟秀华，“副司令”是高二（一）班的徐卫国。

红卫兵的首要任务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习惯)。我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后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更改校名,倡议将我们这所 1895 年创办的老牌省中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附属镇江中学”。这个不知出自于何人的经典倡议,既革命又符合时代的要求,立即得到了全校革命师生热烈支持和积极响应。仅仅一个上午,全校师生一致签名同意。至于“抗日军政大学”是否还存在?即使存在又能否同意我校“附属”?更改校名是否需要有关当局批准等等本应该考虑的疑问早已淹没在革命激情的汹涌澎湃之中了。

紧接着,“运动”就顺理成章地进行到个人的更名换姓。许多师生的革命激情不能自己,争先恐后登出“郑重启示”更改自己沾染“封资修臭味”的名字。有人甚至连“钱”、“资”、“富”这类犯忌讳的姓氏也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一时间卫东、红卫、捍东、文革、卫红、敢闯、要武、东兵满天飞舞,“红”遍校园。

我最要好的学友刘华东也写出了一份改名的“郑重启事”,同时还极力劝说我改名。他说:“‘晓雪’?小资产阶级情调,改了吧。”我不想改。因为我出生在淮海战役战地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拂晓,文人气息很重的父亲触景生情诗兴大发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不象后来有些人在其可爱的童年名叫“小 X”,长大成人后在日益频繁的社交活动中感到不相称而改成浪漫色彩的“晓 X”的。

我反问刘华东为什么要改名。他振振有词地说:“刘华东,‘留’在华东。多不好,革命者志在四方嘛!”我知道他的名字似乎有着和我同样的来历,于是便劝阻他说:“你的名字是你父亲为纪念当年你出生时,他正转战华东。挺革命的,根本不用改。”他沉默了一会儿,收起了他那张更改名字的“郑重启示”。

一天傍晚,我和几十个红卫兵被召集到校红卫兵总部。总部头头和市委工作队的同志告诉我们:今晚全市统一行动,破四旧。在场的红卫兵们都非常兴奋、激动,让我们一展身手的“革命”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们学校地处市郊,许多全市性的红卫兵“革命行动”,如砸路牌、改路名、封焦山寺、推翻金山寺“四大天王”塑像等,此前都因为路远,交通、通讯不便,我校红卫兵均未能参加,这使得我校红卫兵的“革命造反”形象大大地打了折扣。

当晚,我们分成几个小组,由市里来的干部带领,分头出发了。

我这一组被带到了长江边上的京口闸一带,七拐八拐地穿越了几条巷子,来到了一家门前。

朦胧的夜色中,我依稀分辨出这是一家带有小阁楼的两层普通民房。

带队的干部叫开了门,迎出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见我们一副如虎如狼的阵势,什么话也没有说,顺从地靠边一让,我们一拥而入。

我们的任务是查找这户人家可能隐藏的反革命和美(国)蒋(介石)特务的一切可疑证据。

能亲手查获一个美蒋特务,对于我们这些没能赶上革命战争年代好时光的年轻人是多么刺激。我们怀着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刻意板着一副严肃的长面孔,迅即动手,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穿墙凿壁,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仲夏之夜,我感到有些闷热,便推开阁楼通往屋顶的门,只见屋顶阳台上无声无息地坐着这一家四口人。两个孩子依偎着那个开门的中年妇女,双眼左顾右盼闪烁着惊恐的神色;一个中年男子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地吸烟,两眼漠然地望着远方漆黑的

夜空；灯光映照着他那张脸，脸上居然没有一丝儿表情。

直至次日凌晨，我们的搜查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战果”。我们这个战斗小组只是将一些我们认为可疑的物品集中起来交给那位市里来的带队干部，让他拿回去研究分析。返校的路上，战斗员们都有点“出师不利”的沮丧。大家都感到“敌人”真是太狡猾了，即使是在和平年代，革命斗争也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胜的。

多年来，我面对脑海里经常浮现出的那个仲夏夜和那张没有一丝儿表情的脸孔，总也读不懂，猜不透。

此后又有一次，我校红卫兵接市红卫兵总部的命令，派人去焦山增援市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我不等指派便爬上了前来接送人员的卡车。我太想去焦山看看了。

忝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镇江素有城市山林之美称，风光秀丽，名胜林立；其风景绝佳处，当数金、焦、北固三山。三山之中，我从小就偏爱屹立于长江之中，人称中流砥柱、扬子江“浮玉”的焦山。为了准备高考，我已三年多未去焦山了。

我和本校的几十个红卫兵弃车登船驶向焦山。远远望去，往日间云蒸霞蔚，梵铃声声清烟袅袅，红墙黄瓦时隐时现的焦山在灿烂的阳光下载是红旗飘飘，喧嚣阵阵。

我突然强烈地不安起来。

我们来晚了。焦山的定慧寺已遭“革命”，狼藉一片。

大雄宝殿里雄赳赳地走出两位头戴黄军帽，身穿黄军装，臂套红袖标，手持苏（联）式军用武装皮带的矮个子女生，年纪不过十五、六岁上下。就在与她们擦肩而过的同时，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了出自女性之口让人心惊胆颤的狂言：“三天不打人，我的手

就发痒痒!”。

佛堂里羁押了一群老老小小的和尚，他们战战兢兢，或坐或立。

我立刻被一个几乎是瘫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的老和尚所吸引，那老和尚年约七十多岁。看守在一旁的红卫兵告诉我说：这是定慧寺的主持，抗日战争时，他曾给日本鬼子带过路，是一个十足的汉奸！定慧寺里藏有剥削寺院佃户而来的大量金银财宝，他们正在勒令这个老和尚交出寺院的藏宝图，以便搜出这些不义之财上交国库。

我按照市红卫兵总部来人的指令，将这个老和尚带到另一间僧房里继续审问“藏宝图”的下落。

我换用了一套“软手法”，好言好语地诱供。不大一会儿，也许老和尚见我的态度还算和善，又见四下里无人，便颤颤巍巍艰难地撩起衣袍，露出后背，只见其项背上青紫斑斑，鲜血淋淋，显然这是皮带抽打所致。我从未见过如此惨痛如此可怕的人的躯体，我不知这是否是刚才我遇到的那两个女红卫兵的打人“杰作”，太残酷了！我忙喝令他把衣袍放下。他努力睁开肿胀无光的老眼竭尽全力向我乞求道：“哪有什么藏宝图，打死我，也交不出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再度好言规劝他应该老实交代，才能免受皮肉之苦。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口中不停地念道：“在劫难逃，在劫难逃啊！”。

我无心继续“审讯”下去，便走出去向“总部”的人报告该主持和尚交不出藏宝图。旁边有人喊叫起来：“再打，今天一定要叫他交出。”我劝诫道：“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不想立即招来了极为严厉的训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对待汉奸，决不能心慈手软。”一群红卫兵冲进僧房把那个老和尚拖走了。